

屈賦論箋

王志著

上海三聯書店

屈賦論箋

著



上海三聯書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屈赋论笺 / 王志著. —上海 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5. 4

ISBN 978 - 7 - 5426 - 5111 - 2

I. ①屈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楚辞研究 IV. ①I207. 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43065 号

屈赋论笺

著 者 / 王 志

责任编辑 / 殷亚平

装帧设计 / 鲁继德

监 制 / 李 敏

责任校对 / 张大伟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

网 址 / [www.sjpc1932.com](http://www.sjpc1932.com)

邮购电话 / 24175971

印 刷 /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5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×1240 1/32

字 数 / 280 千字

印 张 / 11.125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426 - 5111 - 2/I • 1001

定 价 / 38.00 元

敬启读者,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- 66019858



## 自序

20世纪70年代，香港影人拍了一部电影《屈原》。我的母亲很喜欢这部电影，到了80年代还常常对我提及。可是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并不知道屈原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

闻一多说屈原是个潇洒出尘的美男子；在坊间书肆，也总能看見一些人把屈原画得衣发飘飘，很张扬的样子。这种画法，很多人喜欢；但我还是觉得明末陈洪绶的《屈子行吟图》画得空旷寂寥，似乎更得屈子之真。而且，老实说，我心中的屈大夫毋宁是其貌不扬的，大概因为个子矮，所以喜欢高冠；为了壮胆量，还习惯夹长铗。他常常是苦闷的，叹息的，面容憔悴，衣衫褴褛，为着材朴委而不用，也为着登高丘而无女。我常常想，这样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，一个有益于人类的人，怎么就容不下呢？班固、王逸都说是他自己不忍浊世。可是，俗人说，阎王易见，小鬼难扛，人生的那一边，又怎见得就是干净的呢？

我在中学时代背诵过《涉江》的课文，对诗人说的“驾青虬兮骖白螭，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”，十分地向往。大学时代也曾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一个人静静地读过《离骚》。李泽厚说，两千年来，《离骚》的艺术水平也只有散文文学《红楼梦》还可以比配。我当时可真没看出来《离骚》哪里同《红楼梦》一样好看，我正读得一头雾水，不知其所云呢。等到了研究生时代，老庄孔孟都读不完，就更未暇顾及屈子了。留校工作两年后又读了四年的博士，毕业时论

文做的是屈原非巫论。因为是匆忙间写出来的急就章，好多问题在毕业后也还累积着，每每困扰着我。于是授课之余，我就常常将相关的书找来看一看，再把论文中相关的文字也改一改。就这样点点滴滴，忽而想起，忽而又放下。到了2009年，论文从题目到组织都改了一过儿。到了2011年，又以《百年屈学问题疏证》为题申请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。获得立项后，又优游之三年，终于著成书稿两部：一部《百年屈学问题疏证》，主要论人物；一部《屈赋论笺》，主要论作品。二书相翼而行，都只是提出一些看法供读者参考，离问题的解决当然还远着呢。

子贡曾感慨，孔子家的宫墙太高，所以一般人不能知晓墙内的美。我得承认，对我来说，屈原家的垣墙也太高了些。孔子温良恭俭让，又循循然善诱人，他家的墙再高，也许普通的人翻进去左右采之，左右流之；屈原则不然，他翩然高举，不获世之滋垢，使一切猥琐的人都难免在惭愧中心生厌烦，更哪有兴趣越其墙而观其从容之美呢。所以延及今日，孔夫子的殿堂遍及寰宇，而屈大夫的故园却没为烟泽。这也是人世之所当然，正无需浩叹。

屈原最伟大的作品是《离骚》。司马迁说，“屈平之作《离骚》，盖自怨生也。”这话也许是取自淮南王刘安的《离骚传》。我疑心淮南王是个牢骚满腹的人，《离骚传》又是写给武帝看的，所以他才要说《离骚》“盖自怨生”。不过，他虽是如此说，但他对屈原的体会毕竟较常人深一些，所以他只说“自怨生”，而欣赏的却是其“自疏濯淖污泥之中，蝉蜕于浊秽，以浮游尘埃之外”。后人不察，将《离骚》整篇都看作怨妇似的詈语，那却与淮南王和司马迁无关了。在我看来，《离骚》也只是另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罢了。当然，如果嫌这一首的遐想太长，则不妨去读《橘颂》。《离骚》天上地下，云里雾里，乍暖还寒，方明又暗；《橘颂》不然，生机勃勃，一路读下去，尽是明光与芬芳。

记得李太白的《江上吟》说：“屈平词赋悬日月，楚王台榭空山丘。”这话当然是赞美屈原而贬斥楚王的。但仔细想起来，那日月辉光下的台榭空丘，固然是楚王们的凄凉，但几千年来，不也正是屈大夫们的悲哀吗？不也正是华夏民族最不舍去的乡愁吗？

十多年前，我还曾听研究《红楼梦》的人说，在曹雪芹的原稿中，黛玉原是因为命运无着而愁苦地病死在床上的；如今的后四十回一边写宝钗出嫁，一边写黛玉死人，搞了个对比，乃是很俗很低级的。李泽厚先生也认为这个对比“具有戏剧性，可欣赏，但浅薄”。至于原著的构思，他则比较相信周汝昌的探佚，以为黛玉是沉塘自杀，死在宝钗结婚之前。黛玉果若是沉塘而死，那倒与屈原更有些相似了。至少屈原的死是因为“不忍浊世”，而黛玉也说过“无立足境，方是干净”。不过，我个人并不十分相信周先生的这一探佚。我也不相信林妹妹是病死在床上的。至于对比，也不能说用了就庸俗，关键还要看怎么具体去对比的。况且，即使不采用一婚一死为对比，而相信黛玉是病死在床上或者沉塘而死，那么，黛玉的死就与那些人脱离了关系，从而不构成“对比”了吗？事实上，百二十回本的一婚一死的描写，也不过是以最为强烈的对比形式突显了黛玉因“干净”而死的悲剧性命运。如果仅仅将林妹妹的死单看作是情场失意，那也真是将《红楼梦》这部书白看了。这就像有些人说屈大夫投水只是因为愚忠一样，令人实在有些无话可说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屈大夫投水与楚王无关；也不是说，黛玉不是因为宝玉另娶而死。是的，黛玉当然是因为宝玉另娶而死的。不过，这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因为只有宝玉才是她在这个世界的“知己”，才是她不至于成为第二个贾迎春与妙玉的依仗。假如这个依仗没了，谁相信她这样一个干净的人还会继续活在这个浊世呢？

屈大夫的情况也正在彷彿之间。屈大夫是将人生的全部价值都建立在实现“美政”之上的，而“美政”的实现却又只能依仗楚王，

那么，楚王既不觉悟，屈大夫又能如之何呢？他不死而又何待？有人曾说过，他人即是地狱。这话好像有些道理。至少，林妹妹是喜散不喜聚的；与人相比，屈大夫也是更愿意与橘树长为友兮的。可惜的是，尽管如此，没有他人相与，他们的人生竟然是如此不堪承受之轻，乃至须臾而不可活。也许，有人会想起陶渊明，觉得像他那样躲在一边荷锄带月、饮酒赏菊要好得多。后世的牢骚之士中，也确有一些抑屈崇陶的声音。鲁迅很喜欢屈原了，但也曾感慨“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”。可是，远一点也只是远一点而已；再远一点，我怕陶先生的白璧微瑕也就不仅仅“惟在《闲情》一赋”了。

陶先生的诗，人多喜欢吟诵“采菊东篱下”那两句，而他的“死去何所道，托体同山阿”那六句，却罕有人说。也可惜这样的好诗，黛玉还读得到，而屈大夫却不能知了。奈何！

自有《红楼梦》以来，就有不喜欢黛玉的，这也正如自有楚辞以来，就有不喜欢屈原的。而二人不受待见的原因，也正类同。至少，黛玉乃是有名的伶牙俐齿，常被人视为尖酸、刻薄和小性儿；而屈大夫也娴于辞令，且早在汉代就被批评是一个“露才扬己”、“忿怼不容”的人。比较起来，宝玉倒似乎不是这样的人。不过，奇怪的是，宝玉谁也不爱，却偏爱上了林妹妹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要了解这一点，就需要稍微借鉴一下孟子的思想方法。据《孟子》载，战国时代有个喜欢研究《诗经》的高叟，曾认为《小弁》是小人之诗。为什么说是小人之诗呢？因为自来的传统赞成君子弗怨，而《小弁》的作者却满怀怨愤。公孙丑曾将高叟这一说法拿来问孟子，孟子曰：“固哉，高叟之为诗也！有人于此，越人关弓而射之，则已谈笑而道之；无他，疏之也。其兄关弓而射之，则已垂涕泣而道之；无他，戚之也。《小弁》之怨，亲亲也；亲亲，仁也。固矣夫，高叟之为诗也！”孟子说诗，境界显然是高于高叟了。可是，将人的情感局限在亲亲中，是不是园囿太过局促了呢？难道越人关弓而射我，我

就不可以心有戚戚吗？《吕氏春秋》记载说，荆人有遗弓者，而不肯索，曰：“荆人遗之，荆人得之，又何索焉。”孔子闻之，曰：“去其‘荆’而可矣。”老聃闻之，曰：“去其‘人’而可矣。”可见，人生于世虽不免常有亲疏远近之别，然而所可贵者，去其私也。是故惟君子多怨，多怨，所以亲人也；弗怨，所以尊己也。屈原对楚王、椒兰的“忿怼”，如果仅从屈原的“同姓”身份或者说宗国情感出发来理解，固然不是不可以，但却也是将屈原的心胸看小了。《橘颂》岂不曰：“秉德无私，参天地兮！”屈原的辞赋之所以有时显得尖刻，那不过是因为诗人对这个世界用情太深太过之故。黛玉也是一样，临死之际还不忘嘱咐紫鹃：“我的身子是干净的，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。”宝玉之所以偏爱黛玉，也正因为黛玉对这个世界用情深，所以为人真切、明澈、好恶有方而无所掩，不像宝姐姐，原本也是热的，只可惜冷香丸用得多了，也就恁是动人也无情了。那黛玉得知宝二哥要另娶宝姐姐的时候，据说心里已是油儿酱儿糖儿醋儿倒在一起的一般，甜苦酸咸，竟说不上什么味儿来了。然而停了一会儿，颤巍巍的，竟还不忘嘱诚傻大姐：“你别混说了。你再混说，叫人听见又要打你了。你去罢。”这样的天籁，我们何尝在贾母、王夫人、凤姐和宝二奶奶嘴里听到过呢。亦可见君子之怨迥异乎人也。

作曲家王立平曾说过，他为黛玉的《葬花吟》谱曲，是把《葬花吟》当作屈原《天问》式的作品来确定风格的。黛玉和屈原确实有几分相像，不过，黛玉和宝玉都是不大喜欢做圣贤的，这却与屈大夫不同。大概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，钱穆不怎么欣赏宝黛，却很心仪屈原。可是，做了圣贤又能怎样呢？屈原是贤了，最后也只是一跃而已。孔子是圣了，临终前却也只能哭哭啼啼。而那些宋以来的书生们却只顾着教人们寻找孔颜乐处，全不管几千年来，他们的圣贤就这样地活着，也竟这样地死去。大概钱穆终是钟情于历史的，所以不免把心内事看得太浅，而把身外事看得太重；而宋以来

的那些书生们却又把心内事看得太重，而把身外事看得太轻。

钱穆还曾批评说，《红楼梦》有感慨而无寄托。其实，一个人到了曹雪芹那种地步，早已炼成火眼金睛，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，还哪有什么可以寄可以托的呢？《红楼梦》如果由屈大夫来写，我相信他甚至不会写宝玉带着贾兰去赶科举，这个，也许简直是一定的吧。

我记得很多年前，偶尔在一本很黄很破烂的书上，看到过这样一段故事，说是原壤死了母亲，孔子去帮他整治棺椁。原壤登上椁木，叹道：“久矣，予之不托于音也”，遂歌曰：

狸首之班然，

执女手之卷然。

歌的文辞很简单，但不知为什么，竟让人过目不忘。有时吟诵起来，竟还有虚室生白之感。古人说，太上忘情。原壤有情哉？无情哉？忘情哉？太史公曰：“余读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哀郢》，悲其志。适长沙，观屈原所自沈渊，未尝不垂涕，想见其为人。及见贾生吊之，又怪屈原以彼其材，游诸侯，何国不容，而自令若是？读《鹏鸟赋》，同死生，轻去就，又爽然自失矣。”噫，太史公岂亦忘情者哉？

是为序。

王志

2014年11月11日



## 目 录

<b>自序</b>	1
<b>第一章 论屈赋之文体</b>	1
第一节 屈赋文体之用途	1
第二节 屈赋文体之形成	11
<b>第二章 论《离骚》</b>	38
第一节 作时与作意	38
第二节 形象与结构	45
一 诗人的形象	45
二 诗歌的结构	57
第三节 自叙与自我	66
一 自叙的色彩	66
二 自我的开始	70
<b>第三章 论《九歌》</b>	86
第一节 文体之来源	86
第二节 作时与作意	96
第三节 祭俗与篇数	113
第四节 东皇太一考	124

<b>第四章 论《天问》</b>	134
第一节 文体之来源	134
第二节 作时与作意	146
<b>第五章 论《九章》及其他</b>	154
第一节 《九章》的作时与作意	154
第二节 其他篇什的创作情况	175
<b>第六章 论屈赋之后学</b>	181
第一节 宋玉	181
第二节 二招	194
一 作者与作意	194
二 文体之形式	201
<b>《橘颂》笺</b>	213
<b>《离骚》笺</b>	225

重阅读，品读的阅读理解那是容易有各种版本不同，“离骚子得此而生一脉，安知此之古早歌”，曰《离骚》“士生以舞是如千岁醉

## 第一章

### 论屈赋之文体

#### 第一节 屈赋文体之用途

一般来说，人们并不将屈原作辞赋视为纯粹的文学活动，这无疑是有道理的。不过，现在有不少学者以为，屈原的作品属于实用的巫歌，如张中一先生说：

屈原流传下来的作品《天问》、《招魂》、《离骚》、《九章》、《九歌》五篇都是祭祀歌辞，都必须在社稷的祭坛上面对着祖先陈辞的，表现屈原对祖先神的敬仰和虔诚之心，他想取得祖先神的求证，求得祖先神的福佑，必须要在祭祀祖先神的神坛上迎神、娱神、颂神和送神，屈原的作品都有迎神、娱神、颂神和送神的内容的。<sup>①</sup>

这意见显然是很可商榷的。如张先生说屈赋篇篇都有迎神、娱神、颂神和送神的内容，这就与屈原作品的实际情况不符。且古代国家社稷设于都城，《礼记·祭义》所谓：“建国之神位：左宗庙而右社稷。”<sup>②</sup>张先生说《天问》等篇章属于“在社稷的祭坛上面对着

<sup>①</sup> 张中一：《屈原新传》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30页。

<sup>②</sup> [清]孙希旦：《礼记集解》，中华书局1989年版，下册，卷46，第1235页。

祖先陈辞”，却不知道这些作品都是屈原放逐时期的作品，如何能诵读于国都祭坛之上？《抽思》曰：“惟郢路之辽远兮，魂一夕而九逝。”《哀郢》谓：“当陵阳之焉至今，森南渡之焉如？”《涉江》云：“入溆浦余儻徊兮，迷不知吾所如。”此皆屈原作辞时不在都城之证，张先生说这些辞赋都是屈原在社稷坛上的祭神求福之歌，诚然难以置信。且《怀沙》曰：“世浑浊莫吾知，人心不可谓兮。知死不可让，愿勿爱兮。明告君子，吾将以为类兮。”此等话岂是祭神求福佑之语？可见张先生所言之误。

客观地说，在屈原作品中，除了《九歌》用于祭祀，其他作品多还只是屈原自我辩白之辞，而很难说是什么用以祈福的巫歌。将屈赋中部分告神内容夸大为迎神、娱神、颂神和送神，从而将屈赋都视为祭祀求福之辞，显然无助于正确理解屈原及其作品与巫文化的关系。

以《离骚》为例，《离骚》“就重华而陈词”、“跪敷衽以陈辞”一段的确属于告神之事，但这一段告神，既没有对神灵的歌颂，也没有对福佑的祈求。黄崇浩先生认为，所谓“陈辞”就是请求舜（重华）来神判。他并指出两点：

第一，屈原想到向舜陈辞，这是因为女媭在责备屈原时，曾以“鲧婞直以亡身兮，终然夭乎羽之野”为例，要屈原改变“婞节”，而据《国语·晋语五》，“舜之刑也，殛鲧。”且相传舜南巡死于苍梧，地在楚疆，楚人宜有祀舜之典，是故屈原才想到向舜求取判决。

第二，从屈原向舜陈辞，结果“耿吾既得此中正”看，屈原求取神判的方式就是在舜的神位前占卜：

事实上，“得此中正”乃是筮卦的术语。从《周易大传》可以知道，筮卦时常出现一类爻象，即刚爻（阳爻）或柔爻（阴爻）居上卦之中位或下卦之中位，有一刚得中、一柔得中、双刚得中，双柔

得中和刚柔分中等几种爻象，这类爻象叫做“得中”。凡爻象得中为吉利之象。据此可知，“耿吾既得此中正”，不是说屈原在舜那里“得此中正之道”，而是说卜筮时，根据卦象得中的情形，推知自己向来的言行合乎中正之道的。屈原本来是遵循中正之道的，只不过是在这是非颠倒的时代里，无人给予充分的肯定，逼得他只有乞灵于重华而已。他的陈辞，通过卜筮的形式来实现，也就是卜筮时的“命筮”之辞、祝告之辞。<sup>①</sup>

值得注意的是，黄崇浩先生虽然视屈原就舜陈辞是求取神判，但他并不认为屈原是个巫，也不认为《离骚》是求福的巫歌。对于屈原作品中神判一类的描写，他指出：

屈原……对巫事活动并非是迷信的。他是一位清醒的政治家、哲学家。黑格尔说：“如果哲学家运用神话，那大半由于他先有了思想，然后去寻求形象，以表达思想。”庄子正是这样的哲学家，而与庄子同时的屈原，则是先具备了崇高的理想和伟大的情操，然后才综合运用了巫事活动等宗教形式来予以表现。<sup>②</sup>

这一意见显然是极其正确可取的。《离骚》写到一些告神的内容，无非是假托鬼神之事以申诉自己的追求“中正”无误罢了。而且所谓告神，也只是艺术的想象，未必属实。

谈到屈原创作辞赋的用途，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“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，离谗忧国，皆作赋以讽，咸有恻隐古诗之义。”所谓“恻隐古诗之义”，指同情《诗经》的传统，注重以诗来箴讽政教。班

<sup>①</sup> 黄崇浩：《屈子阳秋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402页。

<sup>②</sup> 同上书，第407页。

固的这个说法显然是看到了屈赋与《诗经》的联系，所不足的是，屈赋重视讽君，但更重视为己争辩，这一点班固在这里没有强调，但从屈原作品的文体指称来看，却是非常清楚的。

对于屈原的作品，从屈原自己到汉代的人，对它总共有“辞”、“颂”和“楚辞”、“屈原赋”这么四种称呼。在这四种称呼中，前两种主要是屈原自己所用，后两种主要为汉人所用。通过对这些称名的探讨，我们也可以认为屈原创作辞赋的主要用途是为自己政治上的追求、信念与节操作讽诵和辩白。

先说“辞”。

《离骚》曰：“济沅、湘以南征兮，就重华而陈词。”又曰：“跪敷衽以陈辞兮，耿吾既得此中正。”其中“陈词”一作“陈辞”，“陈辞”一作“陈词”。“辞”与“词”，同音假借。综观屈赋，“辞”字更为习见，当以“陈辞”为正。《抽思》曰：“结微情以陈词兮，矫以遗夫美人”，又曰：“兹历情以陈辞兮，荪详聋而不闻。”又曰：“惄吾以其美好兮，敖朕辞而不听。”《思美人》：“愿寄言于浮云兮，遇丰隆而不将。因归鸟而致辞兮，羌迅高而难当。”《惜往日》：“不毕辞而赴渊兮，惜壅君之不识。”罗漫先生《楚辞得名新议》一文认为，屈赋里面的这些“辞”或“词”字，是屈原用来指代其作品的部分内容，后世称其作品为“楚辞”或“楚词”，即由此而来。<sup>①</sup>此外，《抽思》“结微情以陈词兮，矫以遗夫美人”，王逸注：“结续妙思，作辞赋也。举与怀王，使览照也。”据此，屈原不仅称自己作品的部分内容为辞，而且也曾将自己整篇的作品称作是“词”（辞）。

那么，屈原为什么称呼自己的作品为“辞”呢？  
《尚书·吕刑》曰：“民之乱，罔不中听狱之两辞。”孔颖达疏曰：

<sup>①</sup> 李诚、熊良智主编：《楚辞评论集览》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1137页。

“狱之两辞，谓两人竞理。”<sup>①</sup>《周礼·秋官·乡士》曰：“听其狱讼，察其辞。”<sup>②</sup>《左传》桓公十年：“虢仲谮其大夫詹父於王。詹父有辞。”僖公七年传文“郑有辞矣”，杜预注曰：“以大义为辞。”又，《左传》僖公四年，传载：“或谓大子：‘子辞，君必辩焉。’”总结上述文献中的“辞”，显系竞理、争辩、自白之意。再者，《说文》曰：“辞，讼也。犹言理辜也。”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据《广韵》所引，认为“讼”是“说”的伪误。又谓：“言部，说者释也。”对于《说文》“说，释也，即悦怿”，段玉裁认为：“说，释者，开解之意，故为悦怿。”余按，《诗经·卫风·氓》“士之耽兮，犹可说也”，郑笺曰：“说，解也。”<sup>③</sup>可见“说”字本就有解脱之意。段玉裁认为“辞”是“说”，而“说”是开解、开脱之意，虽与“理辜”之言犹能相应，但过于迂曲。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说：“纷争辩论谓之辞，《礼记·大学》‘无情者不得尽其辞’，按今所谓口供也。”此言最为明白。且《广韵》所引《说文》未必就不误。大徐本说：“辞，讼也”，语意也通。要之，依《说文》，“辞”的本义就是在打官司时为自己争辩是非以求解脱之言。不过，这只是“辞”的狭义，从《左传》等文献看，一切在纠纷中为自己寻求解脱，申诉是非曲直的话都可以叫做“辞”。

屈原既称自己作品为“辞”，说明其作品本来就是用作辩白。《离骚》“就重华而陈词”、“跪敷衽以陈辞”一段，黄崇浩先生认为是借神判的形式自明清白中正。赵逵夫先生也认为《离骚》“跪敷衽以陈辞”中的“陈辞”，指诉讼、声辩而言。<sup>④</sup>这都是正确可从之论。

除了《离骚》，屈赋的其他篇章也多具有自辩冤屈之用。《哀

① [唐]孔颖达：《尚书正义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，卷19，第650页。

② [唐]贾公彦：《周礼注疏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，卷35，第1087页。

③ 唐文：《郑玄辞典》，语文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464页。

④ 赵说参见崔富章、李大明主编《楚辞集校集注》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334页。

郢》岂不曰：“信非吾罪而弃逐兮，何日夜而忘之？”是亦用为自我声辩。班固曰：“屈原露才扬己，竞乎危国群小之间，以离谗贼。”其说虽近刻薄，但屈赋在内容上具有是己非人的特点，与狱讼竞理之辩白相一致，是不必讳言的。

屈原作品中，最能说明其作品具有诉讼性质的是《惜诵》。《惜诵》开篇曰：“惜诵以致愍兮，发愤以抒情。”王逸注：“惜，贪也。诵，论也。……言己贪忠信之道，可以安君。论之于心，诵之于口，至于身以疲病。”其说迂曲难通。蒋骥认为：“惜，痛也。诵，《增韵》：公言之也。通作讼。愍，即后篇离愍之愍，谓忧困也。盖原于怀王见疏之后，复乘间自陈，而益被谗致困，故深自痛惜，而发愤为此篇以自白其情也。”<sup>①</sup>汤炳正先生基本同意蒋说，并且又着重指出：第一，“惜诵”所通的“讼”字，于诗中为诉讼、狱讼之义。<sup>②</sup>第二，“‘发愤以抒情’之‘情’，则当训为‘情实’之‘情’，非泛指一般情绪。《论语》言讼事时所谓‘如得其情’，《左传》庄公十六年‘小大之狱，虽不能察，必以情’之‘情’，又《周礼·小宰》‘六曰，以叙听其情’，郑注：‘情，争讼之辞。’是‘情’皆指讼者之真实情状而言。”此外，汤先生还指出，《惜诵》中的“所非忠而言之兮”的“所非”是古人发誓之恒语；“指苍天以为正”的“为正”是“为证”的借字；诗中“折中”、“听直”等，皆为古人狱讼之专用语，与首句“惜诵以致愍”相呼应。尤其“命咎繇使听直”的咎繇，是历史上有名的“理官”，专主听讼。本篇从此一句往下，皆是讼词之内容。篇末“恐情质之不信兮，故重著以自明”，则为总结回应之语。“情质”就是“情实”，此句即“言我恐自己所讼之情实不为人们所信，故重复申述以自表白也。”<sup>③</sup>就

<sup>①</sup> [清]蒋骥：《山带阁注楚辞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111页。

<sup>②</sup> 汤炳正：《屈赋新探》，齐鲁书社1984年版，第312页。

<sup>③</sup> 同上书，第312—313页。